

● 中国史

孙中山与民元南北议和

萧 致 治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萧致治(1929-),男,湖南武冈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摘 要] 民元南北议和不纯是革命党人推行妥协路线的结果,更是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南北议和最后能达成协议,是诸多社会力量互相妥协的结果,归根到底,是由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孙中山赞成南北议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共和政府早日成立,以和平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他对议和始终持赞成态度。举袁世凯为总统,也是他的一贯主张,不宜把他说成是反对议和的左翼代表。南北议和是革命党人有原则的妥协。原则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实行民主共和。通过议和,实现了民主共和,是个很大的成功。议和使战争停止,避免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减少了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使双方减少了将士的牺牲,物力的损耗,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由于议和,使北洋军阀得以暂时保存,留下了一个巨大祸根。后来历经 18 年的多次斗争,才彻底消灭了北洋军阀这股反动势力。

关键词] 孙中山;南北议和;民国元年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5-0559-07

1911 年末至 1912 年初,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进行了近 2 个月的议和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清帝逊位,国家实行共和体制,袁世凯继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这次议和谈判,简称民元南北议和。这次议和,与辛亥革命成败有密切关系。过去国内对这次议和的评论,贬多褒少;孙中山被说成是反对议和的左翼代表;让权袁世凯是革命党人推行妥协路线的结果。衡诸历史实际,这些评论不尽合理。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拟对此做些评论。

一、南北议和格局的形成

民元南北议和,是当时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南北议和在几经曲折之后,最后达成协议,也是诸多社会力量互相妥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归根到底,是由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过去把民元南北议和说成是革命党人推行妥协路线的结果,不无一定道理,但存在片面性,即把革命党人的妥协倾向片面地夸大了。不顾情势,把议和的责任全归咎于南方革命党人的妥协,是不公平的。

首先,最早倡导议和的,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在议和过程中,外国侵略势力又充当了导演的角色。英国是当时外国在华势力最大的国家。革命党人首义地在英国势力范围,纷起响应的地区,主要也在英国的势力范围。战火的蔓延与扩大,势必对英国的利益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危

害。因此,他们迫切希望革命战火早日熄灭,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早在武昌起义不到半月,当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向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四国银行团提出一年期 1 200 万两的贷款时,四国银行团的惟一要求就是“赋予袁世凯同革命党人议和的全权”^[1](第 765 页)。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革命烽火遍及全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惊呼:“运动已发展到如此广阔的范围,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具有实际见识的人来说,任何以武力镇压运动的企图大概不会具有很大的成功希望。”朱还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者的角色”^[2](第 60 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 11 月 26 日汉阳之战进入最激烈阶段之际,朱尔典感到“战事的继续进行,将使汉口的英国人士遭受危险并感到惶惶不安”,于是立刻会见袁世凯,陈述了英方意见。袁当面保证,如果能够根据双方都很满意的条款达成一项休战协定,他将乐于下令停战。同时,授权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将此意向转告黎元洪^[2](第 73 页)。英驻汉口总领事葛福秉承朱尔典的电示,立刻着手斡旋,终于很快达成在武汉地区停战三天(12 月 3—6 日)的协议。12 月 4 日,停战刚才实行,袁世凯又会同唐绍仪起草了议和大纲,仍然是通过朱尔典授权葛福“尽力斡旋,保证使这些条款被接受”。其中第一款即为“目前的停战期限届满后,延长十五天”^[2](第 133 页)。此后停战一再延续,直到达成协议。这样,在英使导演下的停战,就成为辛亥革命由军事斗争走向议和谈判的转捩点。

同样,在议和谈判中,英国等外国侵略势力的意向,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南北议和的谈判,英国驻华使节充当了牵线人。议和谈判的地点也是在上海英租界的市政厅。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的寓所,同样是由英方精心安排,住在英国资本家李德立的家中。为了促使南北和谈成功,在英国的串通下,英、日、美、德、法、俄 6 国公使于 12 月 15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共同决定,议和谈判开始前,即由各国驻上海总领事分别向双方代表递交同样内容的照会,强调“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吁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2](第 167 页)。这简直就是对议和双方代表下命令,哪是什么照会?

双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实行共和制,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每当谈判出现波折,总是英国势力在发挥协调作用。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包括美、法等共和制国家,开初皆不赞成。由于南方革命党人坚持不屈,执意实行共和制,大多数国家态度才有所转变。而东邻的日本,由于担心中国改变政体会影响本国政局,仍然坚持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并准备对中国实行强力干涉。议和谈判因此一度停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此多方疏通,并由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代表英国政府表态:“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人民愿意采取的无论什么政体下,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2](第 172 页)日英是同盟之国,日本见连英国都不支持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才“暂时表示同意,以观日后演变”^[3](第 336 页)。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国内各地吁请共和的压力下,也于 12 月 28 日由隆裕太后发布懿旨,同意政体问题“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4](第 155 页)。这样,停顿了 8 天的议和会议,才在 12 月 29 日恢复。通过连续 3 次会议,最终就召开会议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

清帝退位,是实行共和政体、袁世凯当大总统的重要条件。面对这个问题,袁世凯自己不便开口,又是外国势力为之搭桥架梯。1912 年 1 月,南方革命党人已一再表白,只要清帝宣布退位,实行共和政体,就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可是,如果按照双方协议,由各省推举代表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非 3 个月不能成事。因此最简捷的办法是由清帝顺应各方共和要求,自行宣布退位。在这种情势下,英国《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后来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首先建言:“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1](第 830—831 页)结果,在他的策动下,上海商会首先向清廷摄政王等发表通电,汉口商会等继起响应。段祺瑞等 42 名高中级军官也通电赞成共和,要求清帝退位。清廷接到各方来电,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接受退位后的优惠条件,于 2 月 12 日正式宣布退位。

其次,袁世凯赞成议和,尽管别有用心,但他作为议和一方的主持人,也是议和的促成者。没有袁的主持,议和是无法进行的。如所周知,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实为革命党人起义之赐。如果不是武昌起义,至少他不可能如此快速东山再起。袁氏心中明白,清廷起用他,是因为有一支受他控制的北洋军,因此

他只有保存北洋军的实力,才有他的地位。他决不愿孤注一掷,让北洋军与革命军拼个同归于尽。议和则是保存北洋军的最好办法。何况,袁利用南北议和,正可左右开弓,揽取权利。这样,议和对于袁氏来说,又何乐而不为。

从清方来考察,议和导源于清政府的招抚政策。武昌首义之初,清廷中的顽固派不识时务,一意主剿,“以为武昌一隅,大兵一到,指日可平”。但是,袁世凯却认为:“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张剿抚兼施。”^[51](第 269 页)故他一出山,就使出剿抚两手,一方面谕令冯国璋率军大举进攻汉口,一方面又派遣刘承恩“办理招抚事宜”。刘一再致书黎元洪,表示只要接受招抚,“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51](第 278, 281 页)。他们以实行君主立宪做诱饵,企图要求民军“和平”放下武器,放弃民主共和,遭到革命党人的严辞拒绝。汉阳两军决战,尽管北洋军最后获胜,但已造成北洋军的巨大损失。如果每次战役都这样硬拼,北洋军势必遭到灭顶之灾。特别是此时全国已有 14 省宣布独立,三分天下已占其二,未独立各省也不断发生起义。明眼人一看便知,此种形势决不是靠武力能平服的,招抚亦失去效力,惟一办法就是与民党停战议和。

至于议和方针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唐绍仪南下前,已经有所策划。据赵秉钧谈,在唐南下前,洪述祖即向唐绍仪建议,“乘此机会,仿照英法,将中国帝制改造民主。其进行,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迫北方。……创建共和局面,官保为第一任大总统,公(指唐绍仪)为新国内阁总理”^[51](第 289 页)。这个办法得到了唐绍仪的首肯,估计唐也征得袁氏的同意。所以,在议和的第二次会议上,唐绍仪才敢于公开说:“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并说:“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表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41](第 77 页)此后持续一个多月的南北和谈,尽管有过多次曲折,而大旨未出上述范围。虽然在议和过程中,袁氏装模作样,一再申述主张君主立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即使在唐辞去代表职务之后,唐通过梁士诒与袁通声气,仍继续从事促和活动,“秘密私电往返,均从促成共和着手”^[51](第 292 页)。

第三,以张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在促进议和中亦发挥了重大作用。上海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江浙等地的大资本家都集中于上海。他们以张謇为代表,为了使自身经济利益不受破坏,并谋求进一步发展,很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有一个和平环境。张謇等人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眼见革命起义之后,实行民主共和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很快转变为拥护共和。先是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接着就运用他们的地位与影响,在南北间穿针引线,竭力促成议和。他利用与袁世凯的旧谊,“派人前往劝他,不要再去捧持落日,要来扶起朝阳”^[41](第 41 页)。并且与南方革命党人商妥,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帝退位,就一定举他为总统。他告诉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希望袁氏“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41](第 42 页)。袁世凯之舍弃君主立宪,倒向民主共和,与张謇等立宪派的劝说是分不开的。

张謇身为清末状元,受到清廷恩宠。他在转向共和时并没有忘记旧情。为了促使清帝体面退位,一方面劝说革命党人许以清帝退位后给予优惠待遇,另一方面又恳劝清廷看清大势,顺应潮流。他在致清内阁电中说:“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激烈急进之人民,至流血以为要求,喁喁望治之情,可怜尤复可敬。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希望清廷“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关系之巨,荣誉之美,比诸尧舜,抑又过之”^[41](第 41 页)。这纸电文情词恳切,对促使清廷退位,导致议和成功,起了重要作用。更有进者,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是采用了张謇的代拟稿。唐绍仪之出任北方议和代表,也是通过赵凤昌从内部通款曲,“请为国家戮力,南来协商大计”^[61](第 78 页)。后来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出任内阁总理,这种折衷至当、兼顾南北的主意,同样出自赵凤昌。赵说:“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位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

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对此,孙中山、黄兴拍掌赞同,这个问题就圆满解决了^[7](第 196—197页)。凡此都可表明,这批人在议和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南方革命党人赞同议和,也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南方革命党人对议和的态度,以汉阳失败、南京光复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袁世凯出山后,推行招抚政策,以君主立宪、开放党禁等为条件,诱劝革命党人放下武器。革命党人坚持实行民主共和,断然拒绝招抚,反劝袁世凯趁此机会弃暗投明,“共扶大义”^[5](第 281页)，“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8](第 71页)。由于双方的要求差若天渊,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汉阳被冯国璋攻占后,革命党人经过这次实力较量,已知单凭武力推翻清朝统治不是易事。但清朝的军力,也只有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如果能把袁世凯争取过来,推翻清朝统治并不困难。所以,当袁世凯通过英使朱尔典提出议和时,对革命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因而盘恩过江来到武昌时,孙武等人立刻同意停战。军政府都督的印盖被黎元洪带走,不妨仿刻一颗代替。各省代表会议也相应通过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不久,黄兴又致电汪精卫,称赞“项城(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惟项城举事宜速,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9](第 94页)。这些足以说明,通过停战议和,建设共和国,已是革命党人的普遍愿望。即使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亦在所不惜。

考究革命党人趋向议和的根由,最根本的是实力不足,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增长到足以战胜敌对力量的程度。特别是在军力与财力上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从而不得不另筹出路。另外,也有认识上的错误。他们把思想认识的转变,看得太简单,以为清帝退位,共和建立,就算革命目的达到,实在太天真了。

二、孙中山与南北议和

当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酝酿停战议和之际,孙中山尚在欧洲,从事外交与借款活动。直到 12月 25日,他回到上海,南北议和已正式开始一个星期。因此,前段和议,他未能实际参与。在此后的南北和谈,他显得非常关心。1912年 1月 2日,他刚就任临时大总统,即致电伍廷芳,“请每日将议和事详细电知”^[10](第 6页),足见他对议和的进展十分关注。

孙中山此时的中心思想,在于争取共和政府早日成立。因为他在欧美从事外交、借款活动,均很不顺利,原因就在于革命的中央政府尚未建立,外交承认自然无从谈起,借款更无从着手。而当时要解决的燃眉之急是财政困难,别无办法,惟一的指望就是向外借款。至于如何才能使国家早日统一,建立共和政府,孙中山与南方革命党人实际上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筹划北伐,用武力统一中国,在摧毁旧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政府;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和谈,争取袁世凯倒向革命,迫使清帝退位,再举袁氏做大总统。基于这种策略,孙中山对议和并不反对,对推举袁世凯当大总统也很赞同。他的态度是,总统可以“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簿[簿]。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的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11](第 547页)。

前已提到,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孙中山反对议和的观点。这种观点,实导源于 1917—1919年间孙中山自撰的《建国方略》。其在《有志竟成》一节中说,当 1911年 12月回到上海时,中外各报皆说他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他的回答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12](第 246页)这段话因为是六七年后的回忆,不十分准确。查对孙中山当时与《大陆报》主笔谈话,明显有较大出入,孙当时是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耳。”^[11](第 573页)如果把六七年后说的话作为孙中山反对议和的依据,显然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如果全面考察议和前后孙中山的言行,恰恰表明,孙中山不是反对议和,而是赞成议和的。对于举袁世凯当总

统,孙中山也始终表示支持。先拿议和来说,他在回国前,对议和即持赞成态度。1911年11月21日,他与《巴黎日报》记者谈话时即表示:“现在革命之举动,实为改良政治起见,……以平和手段促中国进步,实为吾党本愿。”^[111](第562页)12月21日,孙中山到达香港,又对胡汉民、廖仲恺说:“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为也。”^[111](第570页)孙中山归国之后,几天之内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第二天就致电袁世凯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101](第5页)1月14日,孙在复直隶、河南谘议局电中重申:“临时政府惟一目的在速定共和,本总统受职誓言,即以专制倾覆,民国成立为解职之条件,……南北既可调和,则生灵免于涂炭,不分畛域,自是平等之本怀。”^[101](第20页)1月29日,在复伍廷芳电中复强调:“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共和之目的。”^[101](第50页)这一系列言论表明,孙中山对议和是一贯赞同的,如能不劳兵力,实现共和,可为世界开一未有之先例,何必用兵。

再来看选举袁世凯当总统。早在1911年11月16日,他就致电民国军政府表示:“总统自当推定黎君。惟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111](第547页)这时南北和谈尚未开始,只是黎元洪在11月12日复袁世凯的信中有此表示,目的在争取袁世凯倒向革命,所以孙认为只要合宜也是可以的。后来回到香港,在和胡汉民等谈话中,他更进一步表示:“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州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11](第569页)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孙中山对举袁世凯之得失利弊是经过深思熟虑,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在12月29日被各省代表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因怕袁误会,当天即致电袁世凯表白:“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111](第576页)袁世凯果然因孙被举为临时大总统而深表不满。孙中山又于1912年1月2日复电袁世凯再次申明:“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101](第5页)后来,在具体讨论议和条件时,袁世凯还是有些担心总统落空,孙中山又做了多次重申,强调“推袁一事,始终出于文之意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101](第38页)。这些言论一再表明,孙中山为了以和平手段,达共和目的,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始终一贯。后来的实践也表明,孙中山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诺言。

当然,孙中山并非一意寄望于和谈,对武力统一同样有所准备。如在1912年1月初,即拟订了六路北伐计划,并致电陈炯明:“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101](第7页)到了1月下旬,由于在讨论清帝退位时一再拖延不决,孙中山担心和议破裂,复致电黎元洪做好北伐准备,指出“和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可忽”^[101](第41页)。在致伍廷芳电中则说:“和局至此,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今曾提交参议院,尤极愤激,誓以同心共去共和之障碍。”^[101](第43页)当时真要开战,最大的困难是财政问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穷乏到了极点。孙中山在致陈炯明电中对真情有所吐露,他说:“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101](第41-42页)当时在无款可筹的情势下,为了弄到借款,曾努力向日本财界求助,甚至不惜以出卖东三省权利来换取日方的支持。在接洽借款中,孙对日本三井物产公司派来之森格说:“革命政府的财政穷乏到了极点,假如军队财源不能尽快解决,将完全到达破产境地。万一此数日内没有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则将陷入许多军队离散,革命政府瓦解之命运。”^[113](第106页)由于财政极端困难,北伐只是一句空话。因此,在当时情况下,只有议和,解决清帝退位,建设共和政体,才是较好结局。孙中山赞成议和,情愿让位于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三、议和的成败得失

关于南北议和的成败得失,前人有不少议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与袁停战议和,是否应该?假如不与袁议和,革命是否会有更好的结局?

为了辩明上述问题,首先有必要做点理论探讨。停战议和就是与敌对势力妥协。多年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妥协成为与革命对立的贬义词。实际上,不加分析地对妥协一概否定,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妥协通常有两种:一味妥协求和,不讲原则,这类妥协当然必须反对。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根本利益,有时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谋求暂时妥协。这种妥协则是允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了求得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平息国内叛乱,苏维埃政权代表曾与德奥集团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尽管因此丧失了大片土地,却使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摆脱了国际战争,使新生的革命政权得以保存下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生存,对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争取抗日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妥协都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妥协,是一种必要的妥协,应予肯定。

辛亥革命时期的停战议和,对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也是一种有原则的妥协。这个原则就是民主共和。民主共和是当时的历史潮流,是革命党人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议和中,革命党人始终坚持实行民主共和。最后,通过南北议和,也实现了民主共和。应该说,这对革命党人是个很大成功。由此在中国大地上最终结束了 2 000 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实现了 20 世纪中国的第一个飞跃,大大地把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停战议和,国内许多地区的战火得以停止,遏制了战火向其他地区蔓延,因此避免了战争的巨大破坏,使广大人民减少了战争灾难,无疑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带来了许多好处。这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益的。

战争是一场生死之争。敌对双方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势必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战争本身造成的将士的死亡、物力的消耗,不用说是十分巨大的,甚至是无可挽回的。由于停战议和,人力物力的损失自然因此大量减少。这也是非常明白的。

停战议和无疑是敌对势力之间的一种妥协。既然妥协是双方的,双方都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在这种情势下,对革命党人来说,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不少后遗症。辛亥革命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反封建不彻底。除了给清朝皇帝满蒙贵族势力以许多优惠外,最大的祸害就是使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得以保存下来,并窃据要职,继续欺压人民,致使革命有其名而无其实。中华民国仅保留一块空招牌,还招来了 1915 年和 1917 年的两次帝制复辟。而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这股北洋军阀,后来经过多次斗争,直到 1928 年,通过大革命才最后消灭。

如果不停战议和,辛亥革命是否会有更好的一种结局?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阶级力量的对比上做分析。实事求是来说,当时封建势力已经腐朽透顶,清朝统治已经人心丧尽,要推翻它是大势所趋。它必然垮台,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势力是一种新生力量,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有强大生命力。但在当时仍很弱少,无论在军力、经济力以及社会影响上,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压倒反动势力的地步。这就导致妥协的必然性,只可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不可能经过一次斗争就把封建势力彻底摧毁。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复斗争了近 50 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复斗争了 80 年;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包括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前后也延续达 90 年。中国的革命党人当然比英、法、美资产阶级势力更弱少,又何可能靠一次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呢?何况,当时外国的侵略势力都支持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资产阶级上层也在为袁帮忙。因此,依据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妥协具有必然性。如若革命党人不顾时势,反对妥协,势将如孙中山估计的,革命势力会立刻瓦解。假若出现这种局面,革命很可能以失败告一段落。其结局将会更坏。诚如孙中山后来说的,“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14](第 126 页)。

参 考 文 献]

[1] 骆惠敏.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上 [M]. 上海: 知识出版社, 1986.

[2] 胡滨.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 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 邹念之. 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4] 柴德赓, 等. 辛亥革命: 八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5] 张国淦. 辛亥革命史料 [M]. 上海: 龙门书局, 1958.
- [6]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近代史资料: 53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7] 刘厚生. 张謇传记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 [8]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 3 所. 近代史资料 (1954/1)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4.
- [9]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黄兴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0] 中国社科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 (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1] 中国社科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 (1)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2] 中国社科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 (6)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3] 俞辛焞. 黄兴在日活动秘录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 [14] 中国社科院中华民国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 (3)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SUN Yat-sen & South-North Negotiation in 1912

XIAO Zhi-zh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AO Zhi-zhi (1929-),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Abstract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1912 was not totally the outcome of compromising line carried out by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but was the common desire of various social forces at that time. The agreement reached by the negotiation was also the outcome of mutually compromising among a number of social forces.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was decided by the balance of class forces at the time. The main aims of Sun Yat-sen's supporting the negotiation were to form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to achieve the revolutionary goal by peaceful means. He had supported the negotiation from beginning to end. Recommending Yuan Shih-K'ai as the president had also been his consistent stand. It is not suitable to say that he was a left representative opposing the negotiation.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was the revolutionary party's compromise with a sense of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was to overthrow the rule of autocratic monarchy and to practice democracy and republic. It was a great success that democracy and republic were practiced owing to the negotiation. The negotiation made the war stop, avoided the great damage caused by the war, reduced the people's suffering brought about by the war, reduced the number of generals and soldiers to die on both sides, and cut down the consumption of material resources on both sides, being beneficial to the society and the people. However, the Northern Warlords existed continually, the huge roots of the trouble were retained, because of the negotiation. It was to spend 18 years fighting that the Northern warlord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power, was wiped out entirely afterwards.

Key words Sun Yat-sen; Negotiation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1912 (First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